

周志培 陈运香◎著

CULTUROLOGY AND TRANSLATION

文化学与翻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周志培 陈运香◎著

CULTUROLOGY AND TRANSLATION

文化学与翻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学与翻译/周志培,陈运香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28-3407-6

I. 文... II. ①周...②陈...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0861 号

文化学与翻译

周志培 陈运香 著

责任编辑 / 李清奇

责任校对 / 张 波

封面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735(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 / 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712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628-3407-6

定 价 / 45.00 元

联系我们: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序 1

潘文国

周志培先生的巨著放在我的案头已有一些时日了,周先生是长者,命我作序,我不敢辞,但却迟迟未能动手。一是惶恐,前辈命后辈作序,是抬举,也是责任,生恐说不到位,有负厚命。二是不敢,先生煌煌巨著,五十余万言,在没有读完之前,实在不敢妄置一辞。而要读完,又非一朝一夕之事,需假以时日,而我偏冗事缠身,无暇集中阅读。

现在总算粗读已毕,可以来谈一点感想了,也不过是几点学习心得,借此交卷,说是作序,实是岂敢。

先生此书篇幅宏大,在这些年来的对比与翻译研究著作中,可谓是仅见。特别是先生若干年前已有《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一书问世,不到十年,竟又有此一部大书,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十年前的《转换》一书主要是实践的体会与总结,则本书在理论上又有一个跃升。据我看,这部书可说是十余年来对比与翻译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凡学界这些年讨论与涉及的问题,这本书几乎都讨论到了,而作者每每有其新增的资料和出其不意的见解,足供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所深思。就我本人而言,在读罢此书后感到大受启发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文化、翻译的关系。这三者有关是毋庸置疑的,坊间以此为题的论文集不少,但对三者关系有明确论述和定位的不多。周先生提出可用“翻译三要素”来概括:“转换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转换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其初始目的是传递意义,其最终目的是移植文化。”这一概括十分精辟,是本书的核心思想所在,也是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是作者对文化视角翻译研究的独特贡献。

其二,什么是翻译?这个问题也有过各种讨论。而周先生的别出心裁之处是他利用了 translate 一词在英文的多义性及与汉语“翻译”不完全对应的事实从语言和文化角度进行了再阐释。实际上,在本书的核心命题“转换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中,“转换、传递、移植”三词均可译成 translate,这也是周先生对 translation 的最新解释,值得我们重视。

其三,宏观文化与微观文化。在文化研究中,区别宏观与微观颇为常见,但将两种文化与翻译策略联系起来的似不多见。周先生明确提出,“宏观文化,即文本反映的整体文化……要尽量移植或传递,不能转换,不能翻译;微观文化,即文本语言各层次蕴涵的文化要素视情况可以转换或翻译,也可以移植或传递。”这个说法比笼统地谈“异化、归化”可说前进了一大步。

其四,音译与异化。音译是异化,这大约是没有争议的,但周先生在此基础上深入了一步,说“就语言来说,译语中出现音译词是一种异化,但就文化来看,原文中依附在音译专名上的文化含义丧失得最多,有时几乎丧失殆尽,谈不上是什么异化。”可见,音译的异化价值只存在在语言层面上,在意义与文化层面,音译毋宁说是翻译的失败,至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谈不上有什么价值。提倡音译和异化的人们可要小心了,说不定你们的“成功”背后正是失败的陷阱呢!

其五,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三个流派,分别叫社会交际派、双向交叉或文化参照派,以及文化认同派,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语言文化关系进行研究。但缺少一个把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的提法。周先生在本书中用三句话对其进行了概括:“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模具”,这三句分别对应于上面的 2、1、3 三个流派,可谓十分精辟,也可说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对语言文化关系的最简明扼要的定位。周先生的第三句话实际是目前已成语言研究共识的洪堡特语言世界观和萨丕尔—沃尔夫语言决定论的另一种说法,可能更为形象。

其六,两种语言载体。把语言看作文化载体,这一点是人们的共识,好像没有很多话可说,而周先生却以此为基础,从语言承载文化的能力出发,进一步区分了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种。指出在语言承载文化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承载本民族文化,它完全胜任。一种是承载异民族文化,它不完全胜任。”“我们可以把完全胜任的语言称作天然载体,把不完全胜任的语言称作人工载体。翻译就是通过语言的转换来改变文化的载体,变天然载体(母语言)为人工载体(译语言)。”这就把语言、文化与翻译联系起来了。

其七,对“抵抗式翻译”的质疑。美国学者韦努蒂主张并强调的异化观,由于罩上了“抵抗殖民主义”的政治光环,近年来颇受一些人青睐,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翻译界的“主流”认识。我却以为,如果“异化论”导致“硬译”复苏,“翻译腔”盛行,对中文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几年前我曾质疑,如果反对“流利英文”、保持弱小民族语言文化的特色是“抵抗”殖民主义,那将此方法用到中国,反对“流利中文”,以保持英语等西方语言文化特色,那是要“抵抗”谁呀?我很高兴看到在周先生书中对此又提出了两条新的重要论据。第一,韦努蒂的论断“用来说明英译英国前殖民地民族的文学作品是正确的。但英国在这个时期,除这些译作外,还大量存在着从法语、德语、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而且大多数也是通顺的翻译,其原因是否也是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呢?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二,韦努蒂声称翻译的目的和行为是暴力的,翻译不对原作施暴(使译文通顺),就是对目的语读者施暴(硬使他们接受异的东西)。周先生质疑说:“既然都是施暴,为什么只有向译文读者施暴的人才显身,而向原作者施暴的人却隐身了呢?”我认为周先生的这两条质疑揭示了“异化论”在逻辑上的两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总的来说,周先生这部新作大思精,可供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地方不少。我只是谈了几点初步的体会而已。其实,对于一般学习和研究者来,本书的资料价值也不可忽视。上面我们曾提出本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所谓“集大成”,其实还包括了对这些年来一些问题和理论的研究,诸如意义理论、文化理论、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哲学、翻译理论等,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梳理和概括,充分体现了先生治学范围之广和钻研问题之深,以及高超的钩玄纂要能力。这对于我们的年青学者在治学门径和方法上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最后我要提一下本书中关于英汉数字文化对比这一章。这一章是我的学生陈运香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提炼撰写的。周先生将之收入了他的巨著中,一是体现了他对年轻一辈学者的提携,二是也充实了本书的宏、微观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色。我佩服周先生的识度,也为陈运香感到高兴。

2012年10月14日于上海寓中

序 2

邵志洪

周志培先生嘱我为近作《文化学与翻译》写序,我始终感到不妥当。周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曾有幸为周先生校对过两部著作,《英汉语比较与科技翻译》(周志培等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和《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周志培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可以说,我是看着周先生的书长大的。推辞了好几次,最后恭敬不如从命,也就欣然接受了。我想,所谓先睹为快,作为又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在这里写一些自己的读后感。

说到文化与翻译领域的著作,就必须提及刘宓庆先生的《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和《文化翻译论纲》(修订本)(刘宓庆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文化翻译论纲》研究了文化与翻译的八大中心问题:(1)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第一章),(2)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第二章),(3)文化翻译观念探新(第三章),(4)文化与意义(第四章),(5)语义的文化诠释(第五章),(6)文本的文化解读(第六章),(7)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第七章),(8)文化翻译的表现论(第八章)。具体提出并探讨了文化信息的五种表现手段:图像(image),模仿(mimesis),替代(substitute),阐释(explanation),淡化(decoloration);文化意义获得的四种方式:映射(reflecting),投射(projecting),折射(refracting),影射(insinuating);以及文本解读的四种对策:解码(decode),解构(deconstruction),解析(analysis),整合(reconstruction)。

相比之下,可以看到,《文化学与翻译》(周志培、陈运香著)与《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著)各成体系,但殊途同归,为“文化与翻译”研究构建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

在重要术语的使用和认识上,《文化学与翻译》对“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的说法有不同的见解,开章便对“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提出质疑(1.1节),并对“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提出界定(1.5节)。为“文化与翻译”研究的性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学与翻译》提出了文化学视角下的翻译的定义及其包含的三元素。认为“文化学视角中的翻译是通过转换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个定义可以用一个翻译三元素来概括:转换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

《文化学与翻译》认为翻译中的第三个元素是移植文化,文本中的文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1.4节和11.1节)。把文本中的文化区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并且阐明了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的辩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潘文国先生(2002:10)曾经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没有成熟的翻译理论,所谓‘信达雅’及‘直译意译’之争、‘神似形似’之争等,本质上都是经验型的。新兴的翻译学理论无一不以对比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和出发点,因为只有对比研究才能提供关于双语异同的比较准确的认识,从而使翻译研究减少盲目性。”的确,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发现现有的一些翻译理论往往不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而只有“对比研究”的方法才能建立起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联系。《文化学与翻译》对于文本中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比研究”基础上的,为文化学视角下的翻译构建了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社会文化系统是翻译学的参照范畴,社会文化系统各学科为翻译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及调节因素。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翻译学的论证手段,为翻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及形式论证手段或途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比语言学和符号学。而我们认为能够建立语言学、文化学和符号学之间关系的学科是社会符号学(socio-semiotics)。社会符号学包含了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言内意义(intralingual meaning)和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文化学

与翻译》认为微观文化是蕴涵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包括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其文化因素三分法与社会符号学意义的对应关系如下:语构文化体现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言内意义);语义文化体现的是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指称意义);语用文化体现的是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意义)。《文化学与翻译》对于微观文化的分类全面概括了微观文化符号关系的三个方面,是完全符合社会符号学意义观的,为微观文化翻译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周先生已年近八旬,仍然笔耕不辍,有巨著问世,是我们这些学生与晚辈学习的楷模。所谓“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在学术上我们要有这种豪迈的气概。但愿以此与大家共勉。

邵志洪

2012.3.8

于华东理工大学

前言

文化学视角中的翻译是通过转换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的交流活动。这个定义可以用一个翻译三元素来概括:转换语言——传递意义——移植文化。转换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其初始目的是传递意义,其最终目的是移植文化。这三个元素中涉及了语言、意义和文化三个方面。语言有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之分,意义有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之别,文化有宏观文化与微观文化之异。

A语言承载A文化时,A语言是天然载体,它完全胜任,可以做到天衣无缝、自然和谐。翻译中进行语言转换时,由B语言替换A语言,由它来承载A文化,B语言就是人工载体。《红楼梦》文化由汉语承载,汉语是天然载体。《红楼梦》被翻译成英语,其文化由英语承载,英语是人工载体。人工载体B语言只能在宏观上、总体上承载A文化;在微观上,A、B两种语言因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差异而存在空缺或不对应,所以B语言承载A文化不能完全胜任,做不到完全自然和谐。A、B语言存在差异,B语言是照A语言引进,还是改变以适应B语言,这就产生了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是使B向A异化还是让B同化A,这就构成了异化与归化(同化)的问题。

传递意义是翻译的初始任务也是首要任务,因此,什么是意义也就成了翻译研究中最重要课题之一。本书从第2章到第5章讨论语文学、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化学的意义理论。从这些论述中得到启示:翻译中通过转换语言要传递的意义有两类: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语言意义是词汇按正常句法结构组织起来的没有语境参与的静态意义。文化意义是有一定语境参与和有意向的语言使用的意义,是动态的,具有人文性,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走后门”,其语言意义是通过房子或院子的后门进出。在一定的语境下,它的意义是“比喻通融的、舞弊的途径。”这就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获得的文化意义。

第8章“微观文化”详细分析了文化意义的三个类型: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语构文化是指蕴涵在词、词组、句子和篇章等语言结构各层面中的文化。语义文化是指蕴涵在词和词组意义中的文化。语用文化是指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由语境和意向决定的文化。

语构文化主要与精神文化相关,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外化。西方哲学“天人两分”,以主客体两分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坚持主客体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主客体两分必然导致二元对立的分析思维,而主客体合一必然导致二元补衬的整体思维。二元对立外化在语言结构中,英语句子必须主谓两分。二元补衬外化在语言结构中,汉语句子无须主谓两分,大量句子为无主句,行为主客体浑然一体地蕴涵在动词谓语之中。比如“想死你了”,主客体浑然一体,在一定语境中主体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某个第三人。

汉民族审美意识的特征是:在追求神和形(内容和形式)高度和谐的前提下,偏重于神似,体现出写意性和整体性。西方民族审美意识的特征是:在追求神与形和谐的前提下,偏重于形似,体现出写实性和分析性。由于“天人合一”和“天人两分”而形成的不同哲学基础,由于写意和写实而形成的不同的审美意识,造成中西艺术各具特色的形式构成和技法。中国艺术:散点透视与用线造型;西方艺术:焦点透视,立体造型。散点透视,用线造型表现在汉语结构中是无主谓主轴,无动词谓语核心,呈平面铺陈线性流动样态。焦点透视与立体造型表现在英语结构中是以主谓为主轴,以动词谓语为核心,呈核心扩散立体构架样态。

语义作为文化符号,在结构、语义和语用这三个语言符号中最为重要,因为语义即词汇意义,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代代相传,不断发展,靠的主要是文化符号中的词汇系统。词汇意义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概念意义,另一个是非概念意义。概念意义是对事物的最一般最本质特征的概括,是核心,是

基础,可简称为概念。非概念意义是在概念意义的基础上经过派生和引申,而后附加在概念上的意义,可称附加义或简称意义。“狼”和“wolf”,其概念在汉语和英语中是相同的。由狼的特征残忍和贪婪而引申获得的附加义“残忍”和“贪婪”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是相同的。但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英语由此引申了一个附加义“饥饿和贫穷”,而汉语却没有。We should keep wolf from the door. 如果无语境,从 wolf 的概念可以得出这个句子的语言意义是“我们要把狼挡在门外”。而在一定的英国文化语境中,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我们要挣钱养活自己”。对蕴含在词汇系统中的语义文化,第8章作了详细的分析,它们有三类:概念中的微观文化(8.3节),意义(附加义)中的微观文化(8.4.4节)和由文化项空缺造成的文化独特词(8.4.5节)。为了深入说明词汇中的语义文化,我们还专辟第9章,选取数字作了一个案例性的调查研究。人类的祖先在他们的生存斗争中差不多每天都要在打猎、捕鱼、采集和分配中计数。开始可能用石块标数,或在树上刻印标数,或用绳结标数。后来出现了语言文字,便用语言符号表示。可以想象,由计算需要而形成的数字概念,各民族不会有差别,也就是数字词语的概念意义是相同的。汉语的一、二、三……完全等于英语的 one, two, three……,可是,由数字概念引申和派生出来的文化附加义却完全是一幅不同的情景。有相似的,更有相异的。中国人说“好事成双”,喜欢偶数,而英美人却说“Good things come in threes.”(好事逢三),喜爱奇数。这些相似或相异的文化附加义,折射出不同民族的世界观、哲学思想、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我们从《红楼梦》和《圣经》中选取了大量的语料进行详细的对比,证明了我们在第8章中对词汇语义文化所作分析的正确性。

语用文化是一定文化的人在一定语境下参与交际时发出的话语(utterance)的意义以及蕴涵在这些意义中的文化内涵。它主要与制度文化相关。因为参与交际的人都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言行自然地受制于在母语文化环境中养成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行为规范就是制度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宗法制度,社会行为规范强调等级差序,以区别格局为取向。“上下有义,贵贱有分,男女有别”,其行为规范就是“上尊下卑”,“卑己尊人”。英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相较中国来说,时间要短得多,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却比中国早许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解放生产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从而形成了以平等格局为取向的行为规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的以区别格局为取向的规范形成鲜明对照。汉语中有一套敬辞和谦辞就是这种区别格局在语言中的反映,其语用文化相当深厚。英国社会的平等格局取向使得英语不需要这么一套敬辞和谦辞。《水浒传》五十四回一句“足下,高姓大名?”区区六字简单的话,在翻译中既要传达其语言意义,又要传递其语用文化,而且还要让目的语文化接受,就不那么简单,往往顾此失彼。赛珍珠译为“Noble sir, what's your high name and your great surname?”看似一字不漏,但没有真正表达出汉语这套词的语用意义,而且还可能会让英美人莫名其妙,难道中国人的 name 还有高低之分, surname 有大小之别。夏皮罗译成“What's your name, sir?”典型的英语交际语,十分自然。可是,蕴涵在中国文化中的“卑己尊人”那一套丧失殆尽了。

翻译中的第三个元素是移植文化。文本中的文化有宏观和微观之分(1.4节和11.1节)。宏观文化包括三个方面:(1)文本植根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文化;(2)文本整体内容所反映的文化;(3)文本整体结构所反映的文化。微观文化是蕴涵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包括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翻译中转变语言传递意义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源语文本的宏观文化移植进目的语文化,让其在目的语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至于微观文化,则可以移植,也可以转换,也可以略去,其最终目的也是如何更好地让译语读者接受文本的宏观文化。把文本的文化区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首先,宏观文化在理论上只能移植,不能进行文化转换或文化翻译,因为翻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传输文本的宏观文化。其次,所谓异化与归化的方法论问题只存在于微观文化的处置中。它们可以移植,也可同化,也可省略。所谓的文化转换或文化翻译,只能是处置某些微观文化的方法,因此笼统地说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第三,一般说来,微观文化被移植的部分越大,宏观文化的移植就会越成功,它们是正比关系。但翻译中有些实例证明,为适应目的语文化,微观文化转换或改变得多一些,

移植得少一些,宏观文化反而更易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这里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在翻译实践中的拿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语言文化水平以及目的语文化操控因素的摆布等。第四,凡翻译必跨文化。近些年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个新创造的词用来表示这种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一个是 *cultranslation* (T. S. Halman, 1978),另一个是 *transculture* (Danial Shaw, 1988)。前一个由 *cult(ure)* + *translation* 构成,后一个由 *trans(lation)* + *culture* 构成。所以从构成来看,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一样的。如何把这两个词译成汉语,郭建中开始时把后一词译为“跨文化交际”,后又译为“跨文化翻译”。他避免使用“文化翻译”一词,显然是明智之举,因为正如我们在 1.5 节、1.6 节和 11.6 节中所阐明的,“文化翻译”可能会产生“文化转换”的歧义,而文本的宏观文化只能移植、传递,是不能转换的,只有微观文化可以视情况转换或翻译。所以“跨文化翻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术语,它可以避免歧义,可以准确地反映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问题的性质和实质。第五,仅用“异化”“归化”是不能完全概括微观文化的处置情况的,因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值得提倡的文化融合法(11.7.2 节和 11.7.3 节)。所以,我们使用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同化(归化)三个术语替代“异化”归化。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观点和使用资料,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前辈和青年学者的论点和材料,没有一一列举,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要特别感谢潘文国教授和邵志洪教授在百忙之中阅读本书并作序。

作者

2012 年元月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1 质疑“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	1
1.2 何为翻译,为何翻译	1
1.3 语言意义与文化意义	3
1.4 文本的宏观文化(大文化)与微观文化(小文化)	4
1.5 界定“文化转换”与“文化翻译”	7
1.6 文化移植与文化翻译	8
1.7 小结	10

第2章 语文学时期的意义理论

2.1 概述	12
2.2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意义研究	12
2.3 古印度语文学的意义研究	13
2.4 古代中国的意义研究	14
2.5 欧洲中世纪的语义研究	16
2.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语义研究	17
2.7 18世纪英国普遍语法的语义理论	17
2.8 欧洲19世纪历史比较时期的意义研究	17
2.9 欧洲青年语法学派的意义研究	18
2.10 小结	19

第3章 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

3.1 概述	20
3.2 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	21
3.2.1 指称论	22
3.2.2 观念论	28
3.2.3 使用论	29
3.2.4 言语行为论	30

第4章 语言学意义理论

4.1 概述	35
4.2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36
4.2.1 语言与言语	37
4.2.2 记号、能指、所指	38
4.2.3 结构主义三学派有关意义的论述	40
4.3 功能语言与系统功能语言学	44
4.4 语义学	45
4.4.1 概述	45

4.4.2 二元论与三元论	46
4.4.3 词、意义、概念	47
4.4.4 理性意义与联想意义	48
4.4.5 义素与语义场	51
4.5 语用学	53
4.5.1 语义学意义与语用学意义	54
4.5.2 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学的核心	56
4.5.2.1 规约与规则	56
4.5.2.2 功能与语言间接性	57
4.5.2.3 前提	59
4.5.2.4 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	61

第5章 文化学意义理论

5.1 文化的起源于文化的定义	65
5.1.1 文化起源三标志	65
5.1.2 文化的定义	68
5.1.2.1 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的定义	69
5.1.2.2 人类文化功能学的定义	70
5.1.2.3 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定义	70
5.1.2.4 符号文化学派的定义	71
5.1.2.5 文化定义的两个模式	71
5.1.2.6 中国学者的定义	72
5.2 文化的结构	74
5.2.1 概述	74
5.2.2 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	75
5.2.2.1 物质文化	75
5.2.2.2 制度文化	76
5.2.2.3 精神文化	76
5.2.3 精神文化——文化统一体的核心	78
5.2.4 主流文化、亚文化、群体文化	80
5.3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80
5.3.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80
5.3.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81
5.3.3 语言是文化的模具	82
5.4 文化学	84
5.5 文化符号学	86
5.5.1 记号以及符号学思想的发展	86
5.5.2 语言符号学——普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	87
5.5.3 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文化符号学	88
5.5.4 卡西尔：文化哲学——文化符号学	90
5.6 符号与文化意义	90
5.6.1 符号——文化存在的方式	90
5.6.2 象征与文化	91
5.6.3 符号的意义特征	92

5.6.3.1 解释性与模糊性	92
5.6.3.2 “空框结构”与意义引申	93
5.6.4 文学(艺术)符号的意义特征	94
5.6.4.1 超时空性	95
5.6.4.2 主体性	96
5.6.4.3 独特性	96
5.6.4.4 解读创造性	96
5.6.4.5 增附性	97
5.7 文本意义理论	97
5.7.1 概述	97
5.7.2 塔图学派文本理论	98
5.7.3 文学文本意义的特征	98
5.7.3.1 双重性	99
5.7.3.2 生产性	99
5.7.3.3 动态性	100

第6章 语言的文化视界

6.1 概述	101
6.2 维柯——语言文化视界的开启者	102
6.2.1 维柯新科学——从语言中认识历史	102
6.2.2 共性与个性	102
6.2.3 诗性语言与隐喻	103
6.3 古典洪堡特主义—新洪堡特主义	104
6.3.1 语言与言语	105
6.3.2 语言内隐形式和语言世界观	105
6.4 魏斯格贝尔:语言中间世界——语言世界图	106
6.5 萨丕尔:语言的内面是思维模式,语言是文化模型	108
6.6 沃尔夫——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	110
6.7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影响	112

第7章 语言与文化的交叉学科

7.1 概述	117
7.2 跨文化交际理论	117
7.2.1 交际与跨文化交际	118
7.2.2 跨文化交际的必需条件和根本条件	120
7.2.3 母文化中心主义与跨文化意识	122
7.2.4 对话式跨文化交际	124
7.2.5 符号、编码和代码系统	124
7.3 文化语言学	126
7.4 语言国情学——国俗语义学	127

第8章 微观文化(小文化)

8.1 概述	130
--------------	-----

8.2 文化三层次与语言结构三层次	131
8.3 语构文化	132
8.3.1 汉英精神文化比较	132
8.3.1.1 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	133
8.3.1.2 直觉体悟的具象思维与逻辑分析的抽象思维	134
8.3.1.3 二元补衬与二元对立	136
8.3.1.4 写意(神似)与写实(形似)	137
8.3.1.5 中和与冲突	139
8.3.1.6 散点视与焦点视	140
8.3.2 与精神文化相观照的汉英语言的结构特征	141
8.3.2.1 意合——以意役法,形合——以意从法	141
8.3.2.2 线性流动平面铺陈与核心扩散立体架构	144
8.3.2.3 对应结构与中心结构	149
8.3.2.4 意象与抽象	154
8.3.2.5 圆式与直式	156
8.4 语义文化	157
8.4.1 概述	157
8.4.2 概念与意义	159
8.4.3 “概念”中的微观文化与“意义”中的微观文化	162
8.4.3.1 概念本身蕴涵的微观文化	163
8.4.3.2 概念在语义场中蕴涵的微观文化	164
8.4.3.3 历史与时代赋予词汇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	171
8.4.4 “意义”中的微观文化	172
8.4.4.1 文化象征义	172
8.4.4.2 文化比喻义	176
8.4.4.3 文化引申义	178
8.4.4.4 文化价值观意义	180
8.4.5 文化独特词	181
8.4.6 成语、谚语和歇后语的文化惯约义	187
8.4.6.1 比喻理据	189
8.4.6.2 索引理据	192
8.5 语用文化	194
8.5.1 差别格局取向与平等格局取向	195
8.5.2 中西语用文化比较	197
8.5.2.1 卑己尊人——谦称与敬称	197
8.5.2.2 称呼语	198
8.5.2.3 面子与礼貌	201
8.5.2.4 道歉	203
8.5.2.5 招呼语与问候话题	204
8.5.2.6 回应方略	207
8.5.2.7 小结	209

第9章 英汉语数字文化意义的比较

9.1 概述	210
--------------	-----

9.2 数字与哲学思想	210
9.2.1 老子的数字观	211
9.2.2 毕达哥拉斯的数字观	213
9.3 数字与世界观	216
9.3.1 数字中的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216
9.3.2 数字中的奇数与偶数	217
9.4 数字与宗教信仰	217
9.4.1 数字与基督教	217
9.4.2 数字与道教	220
9.4.3 数字与佛教	221
9.5 数字内涵与谐音联想	222
9.6 数字的模糊意义	224
9.6.1 单个数字表达的模糊意义	224
9.6.2 组合数字的模糊意义	228
9.6.3 数字模糊语义的翻译方法	233
9.7 数字与修辞	236
9.7.1 数字与隐喻	236
9.7.2 数字与夸张	237
9.7.3 数字与转喻	239
9.7.4 数字与委婉语	240
9.7.5 数字与对偶	240

第10章 翻译研究理论范式

10.1 概述	242
10.2 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	245
10.3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248
10.4 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	253
10.5 翻译研究的阐释学范式	257
10.6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范式	260
10.6.1 多元系统理论	261
10.6.2 描写翻译学与常规理论	262
10.6.3 目的论	263
10.6.4 折射、重写与操控理论	264
10.7 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范式	269
10.8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273
10.9 小结	278

第11章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11.1 “文化转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范式	284
11.2 异与同	288
11.3 “和而不同”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290
11.4 异化与同化(归化)	290
11.5 语言转换,同化与异化	293
11.5.1 语言转换中的结构同化	293

11.5.2 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异化	315
11.6 意义传递—妙传、差传与误传	321
11.6.1 妙传与差传	322
11.6.2 误传	327
11.7 移植、融合与同化	335
11.7.1 文本宏观文化的移植	335
11.7.2 微观文化的移植和融合	339
11.7.3 微观文化的同化	349
11.7.4 时空错觉	358
11.8 小结	360
参考文献	361

第1章 导论

1.1 质疑“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

文化能否翻译? 翻译中文化能否转换? 这是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的两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翻译著作和文章中经常提到“文化转换”和“文化翻译”的问题。如(1)有的作者非常明确地说:“翻译不单是语言的转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的转换。”(《汉英翻译基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p. 3)“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且是反映不同社会特征的文化转换过程。”(ibid, p. 10)。(2)为什么翻译是文化翻译,有的作者解释说:“译者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时必然在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p. 319)(3)有的作者写了专著《文化翻译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在(1)中,作者说,翻译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转换。在(2)中,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的道理。本来想在(3)中找到文化翻译的明确定义,可是没找到。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还得从翻译的性质和翻译的目的讨论起。

1.2 何为翻译? 为何翻译?

怀特说:“每当我们提到‘翻译’时,我们都在使用一个隐喻,即‘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因为这个词本身来源于拉丁文‘Tran’(穿过)和‘latus’(即 fero, ferre, fuli 的过去分词, latus: 运送)。因此,它与‘transfer’来源于同一拉丁文动词,意思大体相同,暗示一个人可以将某个东西从一种语言带到另一种语言,就像一个人将某样东西从河的一边搬到另一边……”这种把翻译比作运输的观念使我们默认了一种意义观,即意义就像物体一样可以从发现它的地方拾起,然后放到另一个地方去。”(转引自谢天振 2000, p. 31)沃伦(R. Warre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Translation*, 1989)也曾将传统翻译中把原文的“意义”“转移”到译文中的要求比喻为把一种货物从一个桶子里取出转放到另一个桶子里。翻译就是“搬运”,就是“转放”,语言是存放货物的工具,也是搬运的工具。被存放和搬运的东西或货物就是语言承载的“意义”。我国古代对翻译也有大致相同的定义。如唐代“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罗新璋,1984, p. 1)。宋代“夫翻译者,谓翻译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同上, p. 51)。转换的,改变的是语言,保留的是意义。罗斯(Rose, 1991, p. 5)对翻译中如何转换语言运送意义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她说:“翻译的加工过程,基本上包括三个步骤:第一,理解以语言1形式存在的原语材料;第二,将理解的结果传递到语言2;第三,用大体对等的译语材料将理解的结果表达出来。”理解的结果,自然就是意义,语言由1到2是变,意义由1到2是传递。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翻译研究中不同范式对翻译的定义。

语文学范式 philological approach 对翻译没有下过十分严格的定义,但对翻译的要求可以用忠实两字来概括。在国外,最著名的是泰特勒于1791年提出的三原则:(1)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性质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3)译文应与原文一样流畅自然(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泰特勒在提出这三个要求时,自己也认识到译文要同时达到这三个要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有一个排序,首先要保证的是 idea。其他两项,风格、笔调和自然流畅在必要时都可以放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思想犹如中国的“宁信而不顺”。翻译的第一